

當前臺灣認同問題的形式與本質

一、引言

在二十一世紀即將來臨的前夕，進入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所面臨的問題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其中較為普遍的就是認同問題。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瓦解，世界的政治地圖重新拼組，而拼組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文化認同。最近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預測二十一世紀全球政治之重組或軍事之衝突，當以「文化認同」為其分界線。^① 杭亭頓的諸多論旨頗有爭議，尤其是他過度強調文明間之衝突而忽略對話，實不免以冷戰時代

① 參看·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chapter 6, 中譯參看：杭亭頓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七），頁一六六。

之思考邏輯加之於後冷戰時代，^②但是，杭氏所指出的認同問題在二十一世紀日趨重要這一點，則確有見解。最近杭亭頓也對進入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因為失去了明確的敵國而喪失了認同感的凝聚力，而憂心忡忡，^③可見認同問題在包括美國在內的當前世界各國，確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認同問題在戒嚴令廢除（一九八七年七月）後近十餘年來的臺灣，以深刻而鮮明的方式呈現出來。在戒嚴令廢除以後，過去臺灣朝野所問的「中國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已經逐漸被「臺灣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所取代。一九八七年國民中學一年級的《認識臺灣》教科書所引起的爭議，可以部分地反應認同問題在臺灣的嚴重性。認同問題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而影響臺灣的政黨政治與國家定位，甚至臺灣的文化發展以及藝術創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認同問題的衝擊。就現階段臺灣認同問題的外部現象觀之，至少呈現兩種形式：(1)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互補與緊張；(2)全球認同與本土認同的緊張與辯證。前者是由於中國大陸對臺

② 我最近對杭氏的理論有所評論，詳見拙作：Chun-chieh Huang, "A Confucian Critique of Samuel P.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刊於 *East Asia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16, no. 1/2, (Spring/summer, 1997), pp. 147-156.

③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76:5 (Sep.-Oct., 1997), pp. 28-49.

灣而言，既是歷史上文化上的原鄉，又是當前現實政治的敵對者；後者則隨著高科技發展以及各地區經濟的密切互動而日益強化。這兩種類型的認同問題之所以形成，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是其本質性的因素則由於臺灣的文化基礎較為薄弱，因此形成臺灣的「自我」的游移性。

這篇論文的主旨在於分析世紀末的臺灣認同問題，除第一節說明全文主旨之外，第二節先探討當前臺灣認同問題形成的脈絡及其類型；第三節則參考當代學者既有的研究論著，進一步分析臺灣認同問題的表象與本質；第四節則提出若干結論性的看法。

二、當前臺灣認同問題的脈絡與類型

(一) 脈絡

在分析當前臺灣認同問題的類型之前，首先必須探討臺灣認同問題產生的脈絡。質言之，臺灣認同問題產生於兩個脈絡：(1)臺灣與近代世界互動；(2)臺灣與中國大陸互動。我們進一步闡釋這兩個脈絡。

(1)臺灣與近代世界互動之脈絡：自從十七世紀以後，臺灣就以作為東西交通商貿的橋樑，

而與近代世界發生密切關係。早在荷據時期，臺灣已經成爲荷蘭人將中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日本、荷蘭及東印度各地商館之貿易中心。④明鄭時代鄭氏父子之興起，主要的憑藉力量就是當時的外洋通商貿易。連橫（雅堂，一八七八—一九三六）在所著《臺灣通史》中就說，鄭成功占領臺灣以後，就「與民休息，整軍紀武，以待時機，而財用不匱，以有海通之利也。」⑤遠從明鄭時代開始，臺灣就與東南亞發展活躍的商務活動。十九世紀開始，臺灣的對外貿易日趨興盛。當代學者林滿紅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紀中國的通商口岸的開放，促成了一八六〇年以後臺灣的茶、糖、樟腦大量出口，而茶、糖、樟腦業也是晚清臺灣與西方經濟力量最直接接觸的一環。由茶、糖、樟腦的產銷，可看出西方經濟力量對一八六〇至一八九五年間臺灣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由於市場多由外商所開拓，所以茶、糖、樟腦業在市場初拓時，主要商權均操於外人手中。但國人因本身也有優越的經商能力，生活節儉，經營成本較低，在自己的鄉土經營產業，較外人之在他鄉異域經營機動性高等因素，很快就跟進而且利用外人所開拓的市場，並掌握住商權。茶、糖、樟腦業中的本國資本包括大陸資本，本地資

④ 參考：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占據時期的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九），頁二五—四四；曹永和，〈荷蘭時期臺灣開發史略〉，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四五—六七，尤其是頁六六。

⑤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一九五五），卷二五〈商務志〉，頁四七九。

本，或兼為大陸資本及本地資本的買辦資本。⑥這種現象使臺灣與世界發生密切的互動關係。在日據時代，約二十萬個臺灣青年被日本殖民當局送去東南亞各地戰場參戰，也可以視為臺灣與東南亞發生關係的一種方式。⑦

(2) **臺灣與中國大陸互動之脈絡**：臺灣居民除了原住民之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多是十六、十七世紀以後從中國大陸閩粵兩省陸續浮海來臺，因此，近四百年來臺灣與大陸在社會、經濟、文化上頗有密切之互動。

臺灣的對外貿易從明鄭時代以來就十分發達。到了清代以後，臺灣的對外貿易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對象。林滿紅的研究曾指出：一八六〇年以前，臺灣由大陸進口的物品，幾乎包括了所有的日常用品，其中多半也是手工業產品。而臺灣出口到大陸的物品是以米、糖為大宗，其他出口品亦均屬於農產品。這種區域分工之所以形成，是因為中國大陸到了明末清初，手工業已相當發達，而臺灣當時正值移民社會建立之際，手工業尚未建立，但其所生產的米、糖，又切合中國大陸之所需，因而生產米、糖以換取中國大陸之手工業產品反較本身發展手

⑥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一八六〇—一八九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七），頁一九一。

⑦ 參考：後藤乾一著，李季樺譯，〈臺灣與東南亞（一九三〇—一九四五）〉，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七），頁六九—八四。

工業有利。^⑧

臺灣與大陸之間不僅由於區域分工而形成的經貿關係的密切，而且，由於臺灣居民之祖先多由閩粵各省移民而來，所以文化上特別是宗教信仰上亦有一脈相承之關係。例如廣為臺灣居民所信仰的媽祖，就是源於福建湄州。其餘臺灣的民俗曲藝如南管，亦源於閩南地區。從歷史角度來看，大陸是臺灣人的文化原鄉。

但是，臺灣與大陸的密切互動，到了一八九五年由於臺灣之割讓給日本，而逐漸減弱。一九四九年以後更因臺灣與大陸軍事的長期對立，而加強了這種趨勢。這種歷史的斷裂一直延續到一九八七年七月戒嚴令廢除，開始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旅遊，臺商大量赴大陸投資之後，才逐漸恢復。

(二) 類型

在上述兩大歷史脈絡中，臺灣的認同問題呈現以下兩種類型：

(1) **全球認同或本土認同**：在臺灣與現代世界互動的歷史脈絡中，臺灣是「海洋中國」的重要據點，數百年來的臺灣面向海洋，迎向世界。^⑨尤其是近數十年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

^⑧ 同上書，頁七—八。

戰之後，由於高科技發展與各地經濟關係之緊密，而日益形成的「地球村」，臺灣的「全球意識」日益高漲，尤其是在經濟領域中，所謂「全球化經濟」之觀點蔚為主流。^⑩但是另一方面，在戰後「全球化」的發展潮流之下，世界各地卻也呈現「本土化」的相對趨勢。「本土化」的相對發展趨勢，在近十年來的臺灣在政治領域與文化領域的「自我肯定」心態中表現得尤為清楚。於是，「全球認同」與「本土認同」之間遂不免呈現某種互補性與緊張性。

「全球認同」與「本土認同」之所以在互補之後，不能免於緊張，乃是因為「全球認同」使臺灣居民認同於普遍性的價值系統，而「本土認同」則強調具有臺灣特殊性的價值系統。於是「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遂不免出現緊張關係。而且，更重要是近年來流行的所謂「全球化」論述，實具有相當的欺瞞性。由於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爲人類歷史上近二百年來

⑨ 余英時主張：「從中國史的長程上看，三百多年來臺灣一直扮演著海洋中國的尖端角色。……一方面，二十世紀中葉的海洋中國已發展成熟；另一方面，它和海洋世界也完全融成一片。內陸取向的大陸政權再也沒有力量阻止海洋中國前進的步伐了。」見：余英時，〈序：海洋中國的尖端——臺灣〉，天下編輯，《發現臺灣》（臺北：天下雜誌，一九九二），頁I—VIII。

⑩ 大前研一 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人，參看：Kenichi Ohmae, "Putting Global Logic Firs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Feb., 1995, pp. 119-125, esp. p. 125.

除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之外，唯一的世界超級強權，所以「全球化」論述成爲近年美國若干人士熱心推銷的理論，其有助於美國霸權的發展，乃是不爭之事實。舉例言之，美國的跨國大企業的主持人只有2%不具有美國籍。而且，跨國企業的主持人均與美國本土之政經利益有其千絲萬縷之關係。^⑩僅此一端亦可窺見當前在美國知識界甚囂塵上的「全球化」論述，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利益實有其不相容性。因此，「全球化」與「本土化」之衝突，乃成爲不可避免之趨勢。

(2) **政治認同或文化認同**：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具有密切互動關係的歷史脈絡之下，臺灣居民對中國大陸既離心又向心。從政治史角度來看，數百年來移民臺灣的漢人，對統治中原的政權頗有疏離感，明鄭政權的「反清復明」，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政府的「反共抗俄」，都可以視爲這種對中原政權的疏離乃至反抗的表現。但是，從社會文化史立場觀之，移民臺灣的漢人又常常視中原爲文化或精神的原鄉。於是，在政治領域裡，臺灣居民拒絕認同於統治中原的專制政權，但是在文化領域裡，他們又常常認同於他們祖先的精神原鄉。臺灣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遂不免出現撕裂的現象。

臺灣人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撕裂，實植根於在臺灣人心靈中對中原既

⑩ 參考 Peter Beinart, "An Illusion for Our Time," *The New Public*, October, 1997, pp.20-24.

有「離心力」又有「向心力」這項事實。我過去曾為文指出：⑫臺灣史的主題之一，就是臺灣與中原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戰。所謂「離心力」是指臺灣作為中原漢人移民的海角樂園，一直存有強烈的拒斥中原專制政權，追求自由新生活的內在動力而言；所謂「向心力」是指中原是臺灣居民文化的故土，所以臺灣居民對中原文化具有某種孺慕情懷而言。由於歷史進程中「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推擠作用，以及臺灣與大陸之間的政治史的斷裂，所以臺灣居民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形成某種緊張性乃至撕裂性。

「離心力」與「向心力」的交互作用與推擠這項歷史的主題在歷史思想與文學創作中，以最深切著明的方式呈現出來。從歷史角度來看，鄭成功這個歷史人物在臺灣人的歷史思維中的形象，很能夠彰顯臺灣史進程中「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鄭成功身兼「延平郡王」與「開山聖王」兩種稱號。前者代表南明政權期許鄭成功延續大明政權正統命脈於海外孤島。後者則顯示，鄭成功率領部眾開拓臺灣，又有告別舊大陸開創新局面之涵義在焉。除了鄭成功這個歷史人物的形象之外，從明清以來臺灣的文學作品也一再出現臺灣對中原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張力，我們不

⑫ 黃俊傑，〈歷史意識與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收入，拙著，〈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五），頁一九五—二二二。

再一一說明。^⑬這項潛藏在臺灣歷史文化中的主題，表現而為臺灣人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撕裂與矛盾，使他們在歷史狂流中痛苦掙扎。

這種掙扎也具體地表現在日據時代臺籍知識分子身上。日據時代許多臺籍知識分子將中國大陸視為他們的「祖國」，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日本殖民政策的壓迫所激起的，另一方面是臺灣的漢人在日據時代有相當強烈的漢文化認同，他們將大陸視為文化及歷史的「原鄉」。這種「祖國意識」將臺灣與中國大陸視為有機的文化整體，而不是機械的對抗的敵體。但是，這種「祖國意識」本質上是一種抽象的心理建構，缺乏具體性與現實性，所以日據時代的臺灣知識分子懷抱對「祖國」高度的理想的期待回歸大陸時，立即感受到「理想的祖國」與「現實的大陸」之間的巨大差距，而使美好的憧憬灰飛煙滅。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臺灣光復以後，臺灣正式回歸「祖國」，全面的接觸使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及其引起的不滿，完全爆發，尤其具體表現在臺灣人對於一些臺灣同胞被視為「戰犯」之不滿，到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祖國意識」可謂隨風而逝了。^⑭

⑬ 這種拉鋸張力在明清時代臺灣的傳統文學作品中表現最為清楚，參看：陳昭瑛選註，《臺灣詩選註》（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六）。

⑭ 黃俊傑，〈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大陸經驗〉，收入：黃俊傑編，《高雄歷史與文化》（第四輯）（高雄：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一九九七）頁三五—五八。

三、臺灣認同問題的表象與本質

(一) 表象：「自我」的不確定性

上文所說的這兩種類型的認同問題，為什麼必然會出現呢？從表面上看，認同問題在臺灣之所以有其必然性，乃是由於臺灣的「自我」有其不確定性。從臺灣文化的地理背景觀之，這種「自我」的不確定性乃是由於臺灣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從地理位置來看，臺灣這個島嶼一方面位於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交界之處，另一方面也位於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光互影之處，所以，臺灣人的文化生命既是大陸性格的，又是海洋性格的；既有傳統中國文化因素的積澱，又深受近代西方文化的洗禮。於是，臺灣人的「自我」遂游移於「內陸／海洋」以及「中國／西方」兩大文化光譜之間，而呈現高度的游移性。於是，臺灣認同問題遂難以避免。換言之，臺灣的「自我」的不確定性，實決定於臺灣的地理位置。

有人更從臺灣島嶼的空間性質，推論臺灣文化的特徵在於「悲情文化、受害意識、族群

意識、被出賣的恐懼等等」，^⑮認為中國政治文化的封閉性在臺灣人身上明顯表現出來。^⑯這種說法雖然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但是，由於「地理決定論」的色彩過濃，完全忽略人的意志的自主性，解釋力不夠，有欠周延。因此，我們必須另闢蹊徑，才能對臺灣的「自我」之游移性，提出較為圓融的解釋。

(二)本質：文化基礎的淺薄

臺灣的「自我」的游移性之所以不可避免，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臺灣的文化基礎較為淺薄，所以很容易受到外來力量（如西方文化或政治變遷）的影響而變換其文化形貌，近百年來臺灣的藝術創作，可以在相當程度內為臺灣的「自我」的游移性作註解，尤其是戰後五十年來臺灣文化發展之受到文化以外的力量之支配，更是一個明顯的事實。

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政權易幟之後所牽動的權力變動，對戰後臺灣文化的變化影響至為深刻。戰後臺灣的文化政策之發展，是在國際的、國內的以及臺灣的三個層次之間，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這三個層次間的文化政策的互動，一方面顯示了臺灣文化的兩種特質：(a)臺灣

^⑮ 徐宗懋，〈臺灣人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三），頁一〇三。

^⑯ 同上書，頁一六一。

文化既是中國或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又是獨立的文化單位，(b)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兩種對待文化的態度：保守的與自由派的文化觀。^⑰這些現象說明了戰後臺灣文化政策與政治權力結構之間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種關係在美術史上具體表現出來。

戰後臺灣由大陸來臺的畫家（尤其是國畫家）除了對於故國山河的眷戀之外，大多數人的作品也已形成了固定的風格；他們很自然地將此風格當做繪畫的語言來使用，於是產生「正統國畫」之爭，於是風格成爲一種意識形態。他們爲了維持來自故鄉的文化優勢，很自然地主張他們原有的風格才是「正統」。雖然後來不少人開始以這些風格描繪臺灣的山水，其結果究竟還是與日據時期就盛行的臺灣風景畫有所不同。相對而言，自從日據時代開始，大多數的臺灣出生的畫家，不管西畫家或「東洋畫」畫家大多對於臺灣風景題材非常注意，因爲這是他們日常生活的經驗。^⑱這項事實很能和盤托出戰後臺灣美術史與政治史交光互影之事實。郭繼生最近也較爲全面地回顧戰後臺灣繪畫史，指出五〇年代及六〇年代的成就，不只是日據時期的延續而已，如以傳統風景畫代表日據早期，則摻有日本風格的油畫可以代表後期。他認爲由以上這兩種畫風而產生了一個獨創的地方性風格，這種畫風相當地反映了一種

^⑰ Edwin A. Winckler, "Cultural Policy on Postwar Taiwan," in Steve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22-46.

^⑱ 郭繼生編，《臺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五），頁十三。

「臺灣意識」在美術上的發展。雖然風格上較為特殊，這些畫作在內容上確有其特殊的特質，它們反映了臺灣戰後生活複雜而真實的一面。^⑭

總而言之，臺灣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的繪畫與臺灣的歷史發展及社會變遷有密切關係。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多樣性自有其文化的脈絡可循；另一方面，臺灣繪畫多樣性更顯示了整個社會的生命力。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代，臺灣美術上的重要發展包括：日本滯臺人士與臺灣畫家的交往，內地與臺灣畫家的交流，以及「正統國畫」之爭的開始。整體而言，在五〇年代，對於臺灣的本土經驗的再現較不感興趣。到了六〇年代，無論在文化、思想、文學、藝術各方面，都以引進探討當時西方新思潮為風尚。五月畫會、東方畫會推動的「中國現代畫」運動，企圖以現代為目的而重新解釋傳統。到了七〇年代，文學有所謂「鄉土文學」的出現；藝術上有民間藝術重振運動；美術上較為人注意的是洪通、朱銘的作品；各地古董店的設立，民藝品的收集與愛好正代表了臺灣文化復古的一面。從文化變遷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解釋為對臺灣歷史根源的重視，以及某種臺灣社會意識及自我意識的形成。進入八〇

⑭ Jason C. Kuo, "Painter of the Postwar Generation in Taiwan," in Harrell and Huang eds., op. cit., pp.246-274; Jason Kuo, "Art and Cultural Politics: *Nihonga/Toyoga/Chiao-Ts'ai-Hua in Taiwan*, 1895-1983," in Chun-chieh Huang et. al. eds., *Postwar Taiw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llege park, MD: University Press of Maryland, 1998), pp.210-259.

年代之後，政治上多元化的趨向，尤其是一九八七年的解嚴及稍後反對黨的崛起，使得先前定於一尊的政治文化產生劇烈的變化，而且由於經濟的發展，政府對文化發展的制約逐漸鬆綁。於是在文化上，進入了所謂「大眾文化的時代」。^⑳

從以上當代學者對戰後臺灣美術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作為臺灣文化最為精緻的一種表現，戰後臺灣美術的確深受政治力與社會力的支配。從五十、六十年代現代藝術，七十年代的鄉土主義，八十年代西方藝術的衝擊，以至九十年代多元主義的興起，^㉑都一再印證上述看法。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至為繁複，臺灣處於中西文化之交界這項事實，固然可以解釋部分事實，但更重要的可能是由於臺灣的文化積澱不夠深厚，所以很容易受到各種外來文化潮流或政權的滲透。臺灣文化生命中「自我」的不確定性，當與文化根基之不夠深厚有深刻之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當前臺灣的認同問題，實深植於臺灣文化的病灶之中。

⑳ 郭繼生，〈從現代主義制度到後現代主義——試論四〇年代來繪畫之文化脈絡〉，收入：臺北市立美術館編，〈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一九九一），頁五三—七二。

㉑ 陸蓉之，〈解嚴以後的臺灣藝術發展〉，〈歷史文物〉雙月刊（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九五年十月），頁六二—七九。

四、結論

這篇論文分析的中心課題，是當前臺灣的認同問題。我們在本文的分析中指出：當前臺灣之認同問題的形成，有其源遠流長而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就臺灣與近代世界互動之脈絡觀之，「全球化」與「本土化」兩大發展趨勢，在臺灣激烈爭衡，因而激發「全球認同」與「本土認同」之間的緊張性。這與臺灣的地理位置的特殊以及商貿關係的活躍，有其深刻之關係。再就臺灣與中國大陸互動之脈絡觀之，由於歷史背景所形成的臺灣居民對中原的「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臺灣與大陸之間遂出現「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的緊張性。這兩種類型的認同問題之不可避免，表面上固然與臺灣島的地理位置有關係，但是，細究問題的本質，我們就會發現：臺灣的「自我」之游移性，實與臺灣的文化根基較為淺薄，文化澱積不夠深厚互有關係。

如果以上這些看法上不致大誤，那麼，我們對於臺灣的認同問題，可以提出下列看法：

(1)當前臺灣認同問題，既複雜而又深刻，目前針對臺灣認同問題所提出的兩種主要論述，

或從經貿利益觀點，或從政治利益立場出發，為臺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定位，皆有所不足。經貿利益論者主張，兩岸經濟結構與發展型態互補互利，應密切合作以建立華人經濟圈，由此而漸進到兩岸的統一。政治利益論者則著眼於中共政權對臺灣的威脅，主張臺灣全體居民應建構一個休戚一體生死與共之新國家。以上這兩種論述表面上南轅北轍，形同水火，但是，兩者又有其異中之同：(a)兩者都從短期而流動的利益出發；(b)兩者都從後天的因素（如經貿或政治軍事因素）出發，思考臺灣的認同問題。上述兩者論述雖有所見，而且短期內也可能暫時安頓臺灣認同問題，但是它們都忽略長期而較具基礎性的文化問題。它們未能從文化的角度，為臺灣及未來臺灣的認同問題，奠定可大可久的基礎。

(2)從以上考慮出發，我們主張臺灣認同問題的解決關鍵應在於文化的拓深與發展。從語言文字、社會結構、思維方式等角度來看，臺灣是一個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華人社會，但是也兼具西方及東洋文化之因素。由於臺灣的文化根基較為淺薄，所以，數百年來很容易因政治之變遷而改變文化之面貌或內容，從而造成臺灣文化的「自我」之游移性。針對這個問題，必須厚植文化之基礎，拓深在臺灣的中華文化之內涵，並勇於吸收外來文化質素，以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必須如此，臺灣的認同問題才能獲得較為妥善的安頓。

總而言之，人是活在文化網絡中的動物，「文化」編織了人之存在的意義之網，「文化」也賦予了人努力的方向。二十一世紀前夕臺灣所面對的包括認同問題在內的諸多問題，只有

在文化脈絡之中才能尋得解決的方案。(一九九八年五月一日初稿；九月十四日二稿；十二月十七日三稿)

引用書目

中文論著：

- 余英時，〈序：海洋中國的尖端——臺灣〉，天下編輯，《發現臺灣》（臺北：天下雜誌，一九九二）。
-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一八六〇—一八九五）〉（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七）。
- 後藤乾一著，李季樺譯，〈臺灣與東南亞（一九三〇—一九四五）〉，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七）。
- 徐宗懋，〈臺灣人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三）。
- 曹永和，〈荷蘭與西班牙占據時期的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九）。
- ，〈荷蘭時期臺灣開發史略〉，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
- 黃俊傑，〈歷史意識與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收入：拙著，《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五）。
- ，〈日據時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大陸經驗〉，收入：黃俊傑編，《高雄歷史與文化》（第四輯）（高雄：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一九九七）。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一九五五），卷二五（商務志）。

郭繼生編，〈臺灣視覺文化——藝術家二十年文集〉（臺北：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五）。

——，〈從現代主義制度到後現代主義——試論四〇年代來繪畫之文化脈絡〉，收入：臺北市立美術館編，〈中華民國美術思潮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一九九一）。

陳昭瑛選註，〈臺灣詩選註〉（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六）。

陸蓉之，〈解嚴以後的臺灣藝術發展〉，《歷史文物》雙月刊（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九五年十月）。

英文論著：

Beinart, Peter, "An Illusion for Our Time," *The New Public*, October, 1997.

Huang, Chun-chieh, "A Confucian Critique of Samuel P.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刊於 *East Asia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16, no.1/2, (Spring/summer, 1997).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chapter 6, 中譯參看：杭亭頓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七）。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76:5 (Sep.-Oct., 1997).

Kuo, Jason C., "Painter of the Postwar Generation in Taiwan," in Harrell and Huang eds., op.cit., pp.246-274; Jason Kuo, "Art and Cultural Politics: *Nihonga/Toyoga/Chiao-Ts'ai-Hua in Taiwan*, 1895-1983," in Chun-chieh Huang et.

al. eds., *Postwar Taiw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llege park, MD.: University Press of Maryland, 1998), pp. 210-259.

Ohmae, Kenichi, "Putting Global Logic Firs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Feb., 1995, pp.119-125, esp..

Winckler, Edwin A., "Cultural Policy on Postwar Taiwan," in Steven Harrell and Chun-chieh Huang eds.,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